

容闳与晚清留美教育

魏登云, 张红丽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系, 贵州 遵义 563002)

摘要: 容闳生活于晚清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 他顺乎当时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洋务派自强求富之急需, 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筚路蓝缕, 为晚清留美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留美教育计划虽然中途夭折, 但其影响仍就不可小觑。

关键词: 容闳; 晚清; 留美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583(2008)-03-0004-07

Rong Hong and the Education in Americ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I Deng-yun, ZHANG Hong-li

(History Department, Zunyi Normal College, Zunyi 563002, China)

Abstract: Rong Hong liv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which great sociological changes happened. He followed the world trend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atered for the domestic foreign affairs group's urgent demand by sacrificing his life to the education in America as he considered education for saving country as his main task, though his plan didn't succeed in the end, it brought great influence.

Key words: Rong Ho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education in America

一、引言

晚清留美教育实萌发于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二次鸦片战争击碎了大清帝国“天朝上国”的美梦, 它标志着以“天朝”意识为依归, 通过传统的朝贡体制, 由中华帝国所统领的国际旧秩序被由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所取代。面对军事上的屡屡惨败和外交上的奇耻大辱, 清朝有识之士一方面对被视作“夷邦”的西洋诸邦不得不进行重新审视。如知识分子魏源在 1842 年所编《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这就改变了以往“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 以为不必学”的传统观念^[1], 为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开辟了一片崭新天地。另一方面, 对自身夜郎自大的骄虚心理产生了深刻反思。他们通过血与火的洗礼逐渐认识到, 英法列强之所以打败大清帝国, 完全凭借其坚船利炮。官僚曾国藩倡导:“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尤可期永远之利。”^[2]而李鸿章则认为:“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 并据此提出,

如果中国想要精通外国利器之制造, 作为士大夫们就必须放弃过去“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 既要把握制器的原理, 又要熟习其技术, 这一认识实际上已超出了传统士大夫不屑于“以夷变夏”和轻视科技的陈腐观念^[3]。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 列强“船坚炮利”的根本在于其军事教育和技艺的发达。曾国藩称:“西人学求实际, 无论为士、为工、为兵, 无不入塾读书, 共明其理, 习见其器, 躬亲其事, 各致其心思巧力, 递相师授, 期于日异而岁不同, 中国欲取其长, 一旦遽图尽购其器, 不惟力有不逮, 且此中奥妙, 苟非遍览久习, 则本源无由洞彻, 而曲折无以自明。”^[4]因此, 要抵御列强的侵略, 就必须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教育制度, 造就新型人才。在这一指导思想支配下, 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 清政府先后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学习外国语言的同文馆以及学习外国军事技术的军事学堂, 并以此作为办理洋务自强求富之根本, 这就成为晚清教育改革之嚆矢。然而, 在向外国学习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08-03-15

作者简介: 魏登云, 男, 湖南桃源人,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中,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单凭在国内创建新式学堂、雇请外国教习、讲授外国语言和军事科技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以便置身于庄岳之间,获其精髓。沈葆楨认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微之奥,宜置之庄岳之间”。^[4]在《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请选子弟留学》中也指出:“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5]就这样,清廷中有识之士萌生了出洋留学的动议和行动。近代中国留学教育先驱容闳,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晚清留美教育积极奔走,成为其中最积极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并以其开拓之功永载近代中国留学教育之史乘。

二、容闳与晚清留美教育

晚清留美教育于同治十一年(1872),经清帝谕批,选派120名幼童,分三年四批前往美国学习,从而正式拉开了序幕。虽说它是由于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在军事上的惨败和外交上的耻辱而引起,加之洋务运动深入发展而被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但它的提前到来莫不与中国留学教育先驱容闳积极策划和实施有关。

(一) 容闳生平简介

容闳(1828-1912),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南屏镇)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一生历经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五个时期,胸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理想,筚路蓝缕、百折不挠谋求中国走向文明富强,既是晚清教育活动家之翘楚,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留学第一人。1850年秋,容闳从美国的孟松学校毕业后,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但毫无经济支助。勃朗先生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董事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当时,孟松学校有一个惯例,就是可以资助一定名额的贫困学生进入大学;但接受资助的学生必须填写志愿书,并作出承诺:毕业之后,要担任传教士。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艰难抉择,容闳在其自传中回忆道:“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6]正是

由于抱着谋求祖国文明富强之宏志,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容闳就开始酝酿中国将来的留学教育计划。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6]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抱着教育救国之宏愿回到阔别七年之久多灾多难的祖国怀抱,成为中国毕业于美国著名高等学府第一人。尔后,他活跃于晚清留美教育宏伟事业的最前沿,作为晚清留美教育的策划者和实施者,成为开创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先驱。1912年4月,容闳病逝于美国。

(二) 容闳投身于晚清留美教育

留美教育是晚清社会大变革时期,顺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洋务运动之急需,在黑暗的中国点燃的一盏明灯。但它要驱散黑暗、普照国人,却并非易事。因为近二千年来在人们心中所积淀的传统情结“夷夏之防”早已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容闳冲破传统的枷锁,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开创了近代留美教育之先河。其大致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留美教育计划酝酿、形成时期

容闳致立于留美教育得益于环境熏陶和从小所受的教育。容闳的家乡与澳门毗邻,而澳门当时属于葡萄牙的殖民地,它是西方传教士最早染指的地区之一,因而得享欧风美雨之先。道光十五年(1835),容闳随父来到澳门,在德国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当时,他刚刚七岁,没有什么太多的传统情结令他不能割舍。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全新的世界”进入他的心灵港湾。因此,沐浴欧风美雨,对容闳来说,简直就是顺乎其天性。道光二十二年(1842),容闳随马礼逊学校从澳门搬迁到香港学习。那时,马礼逊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以学校或其他方式在中国推行英国教育”,由于美国教育是从英国教育模式脱胎而来,这就为容闳到美国留学创造了最基本条件。道光二十六年(1846),容闳告别了母亲,与老师布朗一起踏上留美征程。1847—1850年,容闳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至此,可算是容闳留美教育计划酝酿时期。1850—1854年,容闳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在此期间,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日益清晰可见。他在《西学东渐记》中追忆道:“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当我

意志消沉时,往往想反而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为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而茫然无知的人是决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个没有教养的、冷漠无情的人,对于人类的苦痛和邪恶是绝对无动于衷的。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当然快乐也就越少;知道得愈少,痛苦愈少,而快乐也就愈多。但是,这种人的人生观是卑微的,感情是懦弱的,不足以被称为品德高尚的人。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虽然所学可能不如理想的那样完备和系统化,但总算够得上正规标准和大学文科的水平。因此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即将结束以前,我心里已经计划好了将来所要做的事情。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7]由上可晓,容闳置身于异域他乡,以实现祖国“文明富强”为己任,通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完成了留美教育计划的拟定。

2. 为实施留美教育计划作准备

1854—1872 年,是容闳为实施留美教育计划艰难准备时期。在《西学东渐记》中,容闳记载道:“在 1854 年到 1872 年的这段时间里,我不顾命运的坎坷多变,一直为圆满地达到这个目的而辛勤地劳动着,期待着。”^[7]诚然,容闳既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充满荆棘坎坷留美教育之路,他就不得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并泰然接受各种失败的考验,努力寻求成功之路。下面就是容闳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1) 寄望清朝权贵的支持

当容闳于 1854 年从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国的时候,在中国大地上,战火纷飞,曾国藩的湘军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军在长江流域正鏖战不休,而满清王朝又昏庸如故。容闳经过深思熟虑,认为留美教育计划还需“依一定之方针,循序而进”(第一章《容闳的梦》)^[8]。1855 年,容闳来到美国驻中国广州使馆,在这里,他给当时美驻华公使伯驾担任秘书,希望能通过他认识中国的上层权贵,以促成他留美教育计划的实现。史载:容闳“意不在金钱,欲藉派克力,识中国达官。庶几得行予志”^[7]。但不久,容闳发现这个“事少薪薄”的职位与他的留美教育计划似乎关系不大。在失意中,他不得不离开旧职,另觅新职。同年,容闳来到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当译员,潜心研究法律,想开一家律师事务所。在此期间,他祈望能结识清廷的达官显贵,以便帮助他实施留美教育计划,

但“遭香港英籍律师群起排斥”(第一章《容闳的梦》)^[8],结果也是大失所望。翌年,容闳千里迢迢从香港奔赴上海,在海关翻译处供职,待遇不菲。在此地,他因“此间有一恶习,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第三部分《中国第一号留学生:容闳》)^[9]。由于他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他愤然放弃了翻译这一待遇优厚的职位。他在其自传中说:“我对我自己的操守能够自信的,就是廉洁二字,无论到哪里,我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誉,决不能使之受到玷污!”^[7]面对朋友的困惑不解,容闳解释道:“也许我这个人太富于幻想,不切实际,或是太高傲难以发迹。但是在紧张的生活中,一个人必须有幻想,才可以使可能的事情成为现实。人到世界上来,不单单是为活着而劳碌。我曾为求学而不得不努力工作,因而就觉得应该使所学到的微薄知识发挥其最大作用,造福全民,而不是仅为自身利益着想。这样三番五次地调换职业,只是为了试试看我究竟能干什么,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造福于国家的人。”^[7]概言之,容闳胸怀教育救国之大志,以结识和影响朝中权贵为手段,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展转流离,“三迁其业”,其心不可谓不诚,其情不可谓不真。但在那人微言轻、顽固守旧的沉闷氛围中,他的留美教育计划确实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其失败也就在情理中了。

(2) 梦在太平天国旋兴旋灭

容闳寄望朝廷权贵帮助实施留美教育计划之梦破灭以后,他又将视线投向了太平天国。1860 年冬,容闳与两位传教士一道来到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对太平天国进行了一翻考察,其军纪和信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干王”洪仁玕邀请他参与其事、共举大业。虽然容闳表示对此不感兴趣,但他还是愿意贡献七条建议,以此来改造太平天国,为实现其留美教育计划创造条件。其建议内容是:“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6]在此七项改革建议中,第二、三、六、七共四条都是关于建立新式教育的问题。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最早的一位留学生,学成回国所报效祖国者,不外乎以教育制度为重。但由于太平天国处在战争环境中,各位将领都外出征战,特别是在那里,他既看到了革命的合理性以及不可避免性,“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7];又看到农民革命的局限性,认识到太平天国农民军是一些草莽英雄,难以成就大事,因此,他给洪仁玕提出的具

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改革建议被置之高搁。这样，容闳留美教育计划也就成为遥遥无期的梦。他本想借此南京之行，推行其“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借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藉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6]。于是容闳不得不在失望中离开了天京，另寻其它政治力量来推行他的留美教育计划。

(3) 洋务派成就了容闳之梦

离开太平天国之后，容闳一边做茶叶生意，一边捕捉时机。1863年，机会终于悄然而至，容闳在上海的朋友张斯佳把他引荐给了洋务派实力人物曾国藩。当时，洋务派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相对进步的派别，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从而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容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实现其留美教育计划的机会。经过两人晤谈后，容闳发现曾国藩想派他到国外购买机器，以便在中国建立一座西洋机械厂。其实，容闳对此并不感兴趣，但他明白要想实现留美教育计划，必须首先取得曾国藩的信任，所以，他只能曲尽其道，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1865年，容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机器采购回国，并籍此赢得了曾国藩的信任。这就为他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美教育计划提供了契机。1867年，容闳建议在兵工厂内附设一所兵工学校，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由于此建议是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一个环节，故曾国藩欣然采纳他的这一建议，使容闳深受鼓舞，并决定提出他的留美教育计划。为了慎重起见，容闳首先与“志同道合”的丁日昌谈关于留美教育之事。1868年初，丁日昌从上海道升任江苏巡抚不久，容闳即去苏州公署拜谒。为了使自己的留美教育计划顺利通过，容闳可谓煞费苦心，提出了四条建议：“一、建立纯粹为中国资本的股份汽船公司。二、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三、开采矿产以尽地力。四、禁止教会干涉民间诉讼。”^[7]其中“第一、第三、第四条实际上是陪衬”，其中心是第二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我眼光所关注而希望必成的，自在第二条。”^[8]即：“政府宜选派优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9]丁日昌以之上于思想比较开明的总署文祥，但

文祥不久去世，此事遂搁置下来。同年，《蒲安臣条约》的鉴定为日后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奠定了法律基础，其中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须照所有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也照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批准的外国人居住地设立学堂，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办理学堂。”（第一章《容闳的梦》）^[10]这就为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提供了外部条件。容闳获悉此消息，“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11]1870年，天津教案的发生，最终促成了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史云：“‘天津教案’，更使‘外交’和‘自强’两件大事变得重要和紧迫。容闳‘大计划’的提出，碰上了稍纵即逝的最佳时机。”（第一章《容闳的梦》）^[12]在处理此次教案中，曾国藩和丁日昌全权负责。容闳作为翻译同行，他借此机会，鼓动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由于各方共同努力，以曾国藩为首联名签署的奏折传入北京。是年冬，清廷朱批“着照所请”，这样，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终于在久违中尘埃落定了。“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13]

3. 留美教育计划实施时期

虽然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计划的实施却还有一段艰难的历程。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招生困难。由于人们一直以来视外国为“蛮夷之邦”，把去外国当作“放逐”。再加之，有人谣传说美国是荒蛮未开化之地，那里的人会剥下中国人的皮，“安在狗身上”。因此，当时很少有父母甘愿将他们的儿子送到一个遥远得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国家，而且时间长达15年之久。据此可知，招生的困难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最初几乎无人报名。为了解决此问题，容闳不得不去香港招收学生，到那里劝说他的乡亲们送孩子去洋留学。他在其自传中写道：当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学生未滿第一批定额，“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14]，来者中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职是故也。就这样，容闳身体力行、勇挑重担，解决了留美教育计划实施中最突出的问题：招生困难。接着，其它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1872年2月，任命陈兰彬为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其实，此安排亦是用心良苦。正如李鸿章所云：“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15]其阻力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选陈兰彬为委员，“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16]之故。同年夏，第一批幼童30人起程赴美，踏上了遥远的留学之路。以后每年送30人，1875年，最后

一批留学生 30 人也如期到达美国。这样,容闳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可算是初步完成了。

4. 留美教育计划功败垂成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留美幼童一批批到来,潜藏已久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开始表面化。由于这些幼童出国时,年纪尚小,没有太多的传统文化情结割舍不下,他们走进异国他乡之后,就很快融入到美国文化之中。容闳在回忆录中描绘道:离开故乡来到美国的幼童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他们平时性灵上受到的沉重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便都和旧教育的规范不合”^[7]。实际上,这场冲突是中美文化差异之间的冲突。对此,容闳早就有所估计,他说:“因为我这个教育计划的基本原则和宗旨与中国原有的教育理论是相抵触的。同时,中国政府的保守思想极为牢固,一旦招致反对,我的教育计划轻而易举地就会被毁灭。”^[8]随着留美幼童背离中国的传统“道统”越来越远,这就给封建顽固派提供了反对的口实。1881年6月,陈兰彬转述留学事务监督吴子登的意见,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提议将留学事务局裁撤。并声明“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第三章《归去来兮》)^[9]。对于种种非难,容闳抨击道:“这些人对一切进步和改革或促使中国前进的任何措施都切齿反对”,“完全按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在新英格兰的影响下,这些学生的行为和态度随着学识和年龄的增长,逐渐有了缓慢但是明显的变化,文化和环境使他们的言谈举止大不同于刚刚踏上新英格兰土地时的样子。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胸怀形之于外的举止。”^[10]同时,留美幼童背离中国传统“道统”也违背了洋务派留学教育的初衷,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1]本来,容闳与洋务派之所以能够结合,是因为其“西学东渐”的手段与洋务派“师夷长技”的手段即学习洋人的“机艺”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的目的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创立资产阶级制度,而后者则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道统”。以顽固守旧的陈兰彬任留学事务局正监督就是这种目的体现。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对陈、容作过对比分析,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差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12]。这里的“大体”实质上是指封建制度的“大体”。并指出容闳的作用是:“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丞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13]由此可见,陈、

容的结合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以封建“道统”为主,辅之以洋人的“机艺”。故在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其矛盾的根子就是封建性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尖锐对立。故当国内外的顽固派遥相呼应,大肆攻击和反对时,久经政治风浪以圆滑著称的李鸿章带着妥协的口吻对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并致函容闳,“属勿固执己见”,“令其不必多管,应由子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14]。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看似公正,实际上倾向顽固派,因此,加速了撤退留学生的步伐。加之,此时美国反对中国学生入陆海军学校就读,以及美国西海岸出现了“排华”浪潮,从而给中美关系蒙上阴影。这样,由于洋务派官僚的中途妥协以及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容闳尽管费尽周章,也没有能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结果,总理衙门依议,奏准将出洋肄业幼童全行撤回。1881年,全体学生 94 名,被迫返回中国。容闳苦心经营的留美教育计划功败垂成。郑观应扼腕叹惜道:“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15]在《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黄遵宪亦叹惜曰:“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6]

概括上述,容闳怀抱“教育救国”之心,不断探求留美教育计划成功之路,可谓曲尽其道。虽然由于封建顽固派的极力阻挠以及洋务派的中途妥协,加之,中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容闳留美教育计划功败垂成,但容闳对晚清留美教育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三、容闳对晚清留美教育的影响

容闳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新与旧、中与西之间的矛盾冲突非常激烈。他将自己置于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用其所学,为晚清留美教育事业做出了开山辟路的工作。其留美教育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觑。

(一) 首开中国留学教育新纪元

当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获清廷批准时,他激动不已、情不自禁地说:“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17]此言诚为至论。在此之前,虽然在魏晋隋唐时期,有数百名高僧踏遍千山万水、前往印度研习佛学,可以讲这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但那只是作为某些统治者的个人爱好时断时续,而不是作为一项国策,所以往往出现人亡政息的遗憾。尤其是从宋元直到明清,中华帝国凭借其发达的古代文明,严“夷夏之防”、“故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陶然自恋,出国留学学者却寥寥无几。更为甚者,清廷推行的闭关锁国政

策,几乎关闭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故当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连林则徐那样睁眼看世界的地主阶级开明官僚,也不清楚英国的地理位置。与过去相反,容闳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十多年的留美教育计划,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教育国策,使对“天朝上国”自恋了上千年的中国人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原来并非天朝的“中心”,甚至远逊于外部世界,从而结束了自恋,被动承认和接受外部世界的强大。故清王朝虽然撤回了“留美幼童”,使容闳留美教育计划中辍,但并没有放弃留学生计划。实际上,早在1877年,“留美幼童”计划执行期间,清政府选派了近百名海军留学生,分别奔赴欧洲各国学习。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由于泱泱大清帝国被区区岛国日本战败,使国人蓦然惊醒,纷纷效法日本探索富强之路,加之中日文化同源同根,易于学习,而且,日本距中国很近,往返花费少,因而向日本学习就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最佳选择。故此时期,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留日高潮。20世纪初,随着“留日热”的出现,美国深表忧虑。为了吸引更多中国青年去美国学习,美国决定将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用于资助选送的留美学生,加之日本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使人们的反日情绪高涨,与此同时,美国的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明显提高,从而出现了清末民初中国留学史上第一次留美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晚清最后10年,“留学各国的人数总额约为10万人,其中1906年留日学生就在10000人左右”^[13]。自此以来,中国对外派遣留学生虽在某个时期如文化大革命曾一度处于停滞外,其它时期大都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从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在“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留学教育工作成绩斐然,出现了中国留学教育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浪潮。

(二) 造就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批新型人才,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留美幼童”回国后,通过考核,成绩良好,被分派到船政局、机器局、电报局等处任职。据粗略统计,这批留美学生在中国从事海洋和航运业者有28人、从事铁路工作者有16人、从事电报工作者有18人、从事矿务者有8人、从事教育工作者有4人、从事外交与洋务者有31人、从事金融商业者有9人、此外在医务和新闻界也涌现了一些知名人士。20世纪初,清政府适应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被迫推行“新政”,在此过程中,早期归国的留美幼童在工矿企业、外交、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骨干作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其中的杰出人物有:江南造船厂厂长邝国

光、建设京张铁路而享盛名的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唐国安、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敦彦等^[14]。虽然,在早期归国留美幼童中,后来有少数人成为反动官僚政客买办,但大多数人在归国后,一方面将西方各种专门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他们通过译书、办刊物等形式介绍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他们还尝试用西方的科学方法重新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使二者融会贯通。从而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沟通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成为中国迈向近代化的主力军。从这方面来讲,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见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再度兴起的留学热,必将会使中国进入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新时代。

(三) 容闳在晚清留美教育方面开创了三个第一

容闳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在其自传中说:“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实自予始。”^[15]虽然,此前也曾有人留学于欧美,譬如,郑玛诺、谢清高。但其影响远不及容闳。容闳也是晚清留学教育的第一倡导者。对于晚清留学教育,容闳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则是丁汝昌。再从客观上讲,朝廷往美国派留学生虽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但如果没有容闳殚精竭虑的努力,留学生的派遣也难以在19世纪70年代变为现实。此外,容闳还开创了晚清官费留学的第一次。此前,出国留学的只是少数人,而且出自民间。

(四) 体现了中国士子的高尚风范,促进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

美国学生心仪于留美幼童,他们喜欢请中国留学生做游伴,称颂中国留学生“有卓越的风度,都是运动健将,机警、好学”,是“排球、足球、冰上的曲棍球戏的好手,尤其是溜冰,他们的技艺已到达峰巅”;“不仅在运动方面,比我们美国人卓越,在其他方面也要比我们强”^[16]。耶鲁大学校长朴德也给予中国留学生以极高的赞誉:“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以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闲言。论其道德,尤无一人不优美高尚。其礼貌之周至,持躬之谦抑,尤为外人所乐道。职是之故,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肄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凡此诸生言行之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争荣誉也。”^[17]可见,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通过留美幼童的极佳表现已融入美国人的心里,留美幼童在了解美国的同时,也让美国了解了中国。

(五) 为以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经验

自容闳开留学教育之先河,清政府上下对留学教育也逐渐加深了认识。尔后,清政府时断时续地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并且在第一次的基础之上,不断地总结经验,制定了留学教育规章制度并使之日益丰富完善。尤其在 1901 年之后,陆续制定了一些奖励的措施,规定也比较详细,对于奖励的考核严格,这使奖励不至于没有标准。在张之洞的《筹议约束鼓励游学学生章程折》中写到:“至鼓励章程中拟给学生举人进士出身,系遵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上谕办理。其拟奖翰林出身并翰林升阶者,系于大学堂专科及大学院研究科毕业之生,学业精深,在彼国亦视为上选,计其绩学年分,已逾十五六年,较之新进士馆选,其难以加数倍,且须俟回国后由钦派大臣详加察核。果系品行端谨,毫无过犯,并按照所学科目切实考验,确与所得学堂文凭相符,始行奏请给奖,似尚不致冒滥。”^[16]这样的奖励制度在当时来说是比较规范和完善的,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滥奖。

(六) 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既符合世界之潮流,又适应了国内“自强求富”之需要

19 世纪,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实现本国的富强。当中国掀起洋务运动时,北邻俄国在实施废除农奴制改革,东邻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而对外派遣留学生成了两国的重要举措。这引起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的关注。1863 年,拣选知县桂文灿条陈总理衙门中称:“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行之。”^[17]1865 年,掌四川道监察御史陈廷经曰:“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绝世,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胜西洋,由是为海外雄国。”^[17]同年,薛福成在《上曾侯相书》中主张:“仿俄人国子监读书之例,招后生之敏慧者,俾适各国,习其语言文字,考其学问机器。其杰出者,旌以爵赏。”^[17]容闳更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竭力呼吁:“政府亦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17]

由上可见,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既符合世界之潮

流,又适应了国内“自强求富”之需要。通过留美教育,它不仅造就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批新型人才,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且为以后的留学教育提供了经验,还体现了中国士子的高尚风范,促进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特别是首开了中国留学教育的新纪元。容闳以开创晚清留学教育三个第一而载入史册。

综括全文,容闳生活于晚清社会转型大变革时期,他顺乎当时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潮流和国内洋务派自强求富之急需,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筚路蓝缕,为留美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其留美教育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其影响仍就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 [1]中华扬.中华再起[EB/OL].<http://www.ournovel.com/mulu/mulugo215.html> 24K 2007- 3- 17
- [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6.
- [3]徐泰来,罗绍志.学者笔下的曾国藩[M].长沙:岳麓书社,1997.
- [4]沈葆楨.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A].陈学洵,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 [5]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6]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5.
- [7]容闳.西学东渐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 [8]钱钢,胡劲草.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M].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2004.
- [9]陈再明.古今人物逍遥游[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0]李鸿章.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A].吴如论.李文忠公全书[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1]莹宝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12]郑观应.考试上[A].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 [13]李晓玲.浅谈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J].中国电子教育,2006,(4).
-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15]宋焱.容闳与一百二十名官学生[A].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 [16]张之洞.筹议约束鼓励游学学生章程折[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 [17]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徐国红)